

中国投资环境论坛

世行建议:中国应降低企业“时间税”

世界银行排序中国城市竞争力,称中国投资环境效率仍有待提升

□本报记者 阮晓琴

杭州、青岛、绍兴、苏州、厦门和烟台这6个城市被列为金牌城市;北京、大连、宁波、上海、深圳等13个城市被列为银牌城市。

在11日于杭州举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满脸络腮胡子的美国人、世界银行驻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发布了名为《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投资环境报告》。

杜大伟表示,投资环境的高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因此他与与会者指出,投资环境效率提升的关键在于政府效率。

台下,中国几十个市长级地方官员坐在听众席上洗耳恭听。

“时间税”杭州最低

“就地区来说,东南城市‘时间税’较低,杭州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城市。”杜大伟表示,被调查企业说,一年只花8天时间跟政府打交道。

世行用“时间税”来说明投资环境的效率。杜大伟表示,“外资之所以来到这个城市投资,是因为整个投资环境比较高效,这样他们的企业能够正常的运转。”

调查表明,排在最前的20%的城市,外资企业占到了样本的30%,而排名最后的20%城市,外资企业只占了调查样本的5%。

而在进出口通关时间这一项,排名前10%的城市,平均需要5.4天以下,而排名最后10%的城市里面需要20.4天以上。我国东南地区通关时间为8天,惠州、东莞、江门通关时间只有3天,而在东北则要达到16天。

调查显示,四家主要政府机构(税务局、公安局、环保局和劳动保障局)对企业的干预时间差别很大。排名最前的10%的城市,被调查企业反馈平均每年与政府打交道的的时间少于36天。而排名最后10%的城市,被调查企业每年要用87天以上的时间与政府

打交道。

企业贷款需付“小费”

“企业在旅行和娱乐上的花费”,看上去很美的一个措辞,其实是世行报告对非正规支出这个指标的隐晦使用。世行认为,这些花费可能会成为给官员的非正规支出,从而成为腐败的工具。

杜大伟说:“我们去问企业,你是不是要付一些非正式的钱来获得一些贷款呢?”结果显示,在西北,10%的企业说要付一些非正式的钱来获得银行贷款,一些城市甚至达到了20%。杭州是2%,比例最低。

与付费贷款相对应的,是小型私有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成功率。

调查显示,在中国大多数地区,50%的小型私有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这个比例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已经非常不错。

调查显示,在杭州,100%的小型私有企业都能够获得银行贷款;在佛山、台州,三分之二小型民营企业能够获得贷款。就区域来说,环渤海地区小型内资私企贷款比例是51%,东北中小企业的贷款可获得率则低到只有可怜的25%。

政府效率短期能改变

杜大伟用了一半时间来证明政府效率的问题。

他说,落后地区在短期内,虽然在城市硬件、医疗卫生上的水平是难以改变的,但政府办事效率是可以迅速提高的,并因此能提高生产效率和吸引外资。

报告称,在“政府效率”中排名最后20%的城市通过学习山东、广东、浙江和江苏等领先城市,提高地方政府效率,增加劳动力灵活性和改进金融,预计在短期内企业生产率可提高25%-35%,外资企业数量增长15%-25%。

另外,排名后20%的城市如果可以提高环境、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将使企业效率提高25%,外商投资增长10%。



根据世行报告,我国东南地区通关时间为8天 资料图

■ 高端访谈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呈现从本国搬到国外的趋势 杜大伟:西部应考虑增加吸引力

1986年,杜大伟来到杭州,“那时,杭州很美,但经济发展并不好”。

时隔二十年,2006年,杜大伟再次来到杭州。在依旧感叹杭州很美时,他下意识地将对杭州与韩国比。

12日,上海证券报记者在杭州世贸中心对杜大伟进行了专访,表示中国西部应增加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

东南部引资潜力最大

杜大伟一开始就将中国东南部与韩国相比,“其实东南部投资环境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今后十年,东南部引资潜力最大”。

“在发达国家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通过交换意见看,中国东南部投资环境已经很好了。”杜大伟表示,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印度好,但还要考虑如何加强政府监管。

至于与韩国比较来说,东南部城市比如杭州,在资金、

技术人才条件上不如韩国。“中国沿海城市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需要转向高科技和服务领域。杭州可以发展教育,培育出适应高科技需求的劳动力。”

“我们也不用这些消息,是为促使当地改善环境。”杜大伟认为,仅靠一个报告,对资本市场是无效的。世行会关注、推动中国投资环境的改革。

世行是第二次发布中国投资环境报告。杜大伟透露,从数据收集到正式发布,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约耗资40万美元。

世行还有个打算,今后每两年发布一次中国投资环境数据。

对于世行的巨资金投入,杜大伟说,世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帮助中国实现发展。现在大部分投资者在东南部,而世行的项目都是远离东南,在西北、西南,如长沙、武汉和西安一带。

“我们也不用这些消息,是为促使当地改善环境。”杜大伟认为,仅靠一个报告,对资本市场是无效的。世行会关注、推动中国投资环境的改革。

劳动密集型产业去留

杜大伟透露,现在中国正在出现一个趋势,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搬到国外,比如像孟加拉国,而不是转移到中国内地城市。

而事实上,中国内地很多城市的劳动力价格也比较便宜。

“要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南部转移到内地,中国中部、东北部、西北西南必须采取措施。”杜大伟比较了广州和贵阳的投资成本,向记者表示,两地土地成本接近,贵阳在运输成本上明显处劣势,劳动力成本上居优势,综合起来,贵阳比广州有更强的成本优势。

“现在中国运输网发展非常快,像贵阳、武汉、长沙,运输成本劣势是非常小的。”

杜大伟认为,像贵阳这样的城市,需要更少的投资手续,改善整个物流环境,在海关服务和运输服务方面做进一步的改善。

亚太能源研究中心:

中国交通污染将进一步加重

□据新华社电

记者12日从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三届五次会议上获悉,在未来15年内,中国轿车保有量将会高速增长,汽车尾气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将进一步加重。

据了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汽车保有量以年均22%的速度迅速增加。2005年,全国汽车、摩托车的保有量分别超过4300万辆和9400万辆。

据国合会高层课题组专家介绍,由于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加,机动车污染水平低等多种原因,给城市环境带来的污染显著增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排污量大,污染物排放达标率低;二是与机动车相关的污染物超标严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调研成果发布

品牌和融资成海外华企两大劣势

□本报记者 徐虞利

近日,由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调研成果显示,近13%的企业有意愿进行海外投资,而品牌和融资手段被认为是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竞争的两大劣势。

据悉,该调查成果是国际金融公司外国投资咨询服务机构对

内八大重点城市150家企业进行调研所得出的。被调查企业中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占主体达80%,有132家企业已投资海外,投资产业以第二产业为主。

调查显示,市场开发、获取战略资产、全球竞争战略成为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三大动因,而市场开发成为重中之重;品牌和融资手段的劣势表现最为突出。

■ 房产

任志强:我们只是当丫环的

□本报记者 蔡国兆

“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

在11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地产节的一个论坛上,当被记者问及“房地产商对社会应承担什么责任”时,地产界名人任志强提出了这一“丫环论”。

任志强在论坛上说,我们要承担大量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的公共事业,而这些公共事业是我们

企业其他的东西去弥补的,我们说国有企业从政府那儿占到便宜,其实有很多我们没办法告诉大家投入到公共事业的投资。

对于任志强这一“丫环论”,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不予赞同。不少学者说,我国早已走出政府强势干预企业的时代,将个别现象当作普遍现象是谬误的。

“任志强的话可能只是一时情绪所致,不必太过当真。但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是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家。”上海一位房地产评论人士称。

“银十”尚且不如“金九” 10月上海住宅成交环比跌一成

□本报记者 李和裕

虽然在楼市传统旺季的9月,上海商品住宅市场的表现有所回暖,但这种回暖并未延续至10月。昨天,中房上海指数办公室发布最新报告显示,10月上海新房成交规模为169.7万平方米,比9月减少了21.1万平方米,成交面积环比降幅达11.1%。中房上海指数办公室的分析

师介绍,10月上海新房市场表现属差强人意,不过与去年同期相比,成交规模增长了17.7%。报告还显示,10月中房上海住宅价格指数为1305点,与房价指数最高的去年5月相比下降了10.4%。

分析师表示,在上海新房市场中,上海本市居民购买约占75%,其余为新上海人和海外人士,也都是以自住为主要目的,房价因此有望在平稳态势中运行。

廉洁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

□周金海

11月11日,世界银行公布了中国120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报告:杭州、青岛、绍兴、苏州、厦门和烟台列前六名,为中国投资环境的“金牌城市”,北京、大连等十三个城市被列入“银牌城市”。

这一评选结果一出来,立即有经济学家提出质疑,认为北京、上海两大城市落选投资环境“金牌城市”不科学,理由是世界500强在北京和上海投资的企业都达到400多家,北京的人均GDP名列全国第四位,上海则名列全国第一位。记者在认真研读了相关报道后,认为这位经济学家的质疑有些牵强,投资的企业

多和人均GDP位居前列,很大程度是本地自然优势优越的结果,与投资环境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实际上,世行的排名标准是非常科学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和反思之处。从国际范围内的经验来看,投资者非常看重当地政府的廉洁和效率,在此次世行的排名中,这两个因素占据了相当的分量。

先说效率。对于企业投资者说,效率不仅意味着成本的降低,更意味着竞争力的提高和效益的提升。许多投资项目具有很强的时间要求,与效率高的政府打交道可以迅速走完相关投资程序,产品可以迅速占领市场以比较快的速度收回投

资,而与效率低的政府打交道,则可能贻误商机,将增大投资者的变数,加大其投资风险。因此,在一些投资项目上,提前几个月与滞后几个月有着天壤之别。

世行的排名恰恰考虑了这个重要因素。在进出口通关时间这一项,排名前10%的城市,平均需要5.4天以下,而排名最后10%的城市需要20.4天以上;排名最前10%的城市,四家主要政府机构(税务局、公安局、环保局和劳动保障局)对企业的干预时间少于36天,而排名最后10%的城市,被调查企业每年要用87天以上的时间与政府打交道。对照一下相关部门就不难发现,这些数据与公众的感觉是基本一致的。

再说廉洁。投资者对政府的廉洁程度从来都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廉洁的政府,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成本,也因为它对法律和制度的严格遵守,使得企业经济行为和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更高,暗箱操作更少,企业的利益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和保障,企业与政府

之间的相处也更为融洽。这次的世行投资环境排名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企业在娱乐和旅行上的支出有可能成为腐败的工具,在排名前10%的城市,企业在这方面的支出占收入的0.7%,而排名最后10%的城市为1.9%,相差一个百分点很多。别小瞧了这一个百分点,对于年收入数亿元的企业来说,这是一笔非常惊人的开支。

腐败行为会制约效率,进而影响投资环境,这次世行的排名直观地反映了这种差距。那些排名靠前的城市应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改善投资环境——这远比关注排名本身要有意义。

廉洁行为会制约效率,进而影响投资环境,这次世行的排名直观地反映了这种差距。那些排名靠前的城市应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改善投资环境——这远比关注排名本身要有意义。

成本定价何以屡遭公众质疑

□魏也

据《京华时报》报道,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对《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供水企业管理人员工资及福利费、业务招待费、取暖费、会议费和差旅费等,均可作为期间费用计入成本,但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业务招待费不超过主营业务收入净额的5%。

发改委从成本入手,目的是为了控制企业的成本,防止企业将不合理费用通过打入成本向社会转嫁,但是,事情的结果又常常背离这个初衷。企业的成本是最不透明的

一部分,公众无法对企业的成本进行核实,而企业尤其垄断企业也常常利用这一点,不断增加职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加之招待、差旅费用的快速增长,企业的成本急剧膨胀,而新增的成本,基本上都通过涨价轻易转嫁到公众身上,这正是公众对成本定价机制常常愤愤不平的原因。

有效控制成本是企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实际上,当今世界上,凡是成功的企业,无一不是控制成本的高手,而我国的一些企业不仅没有控制成本的意识,还常常人为地抬高成本。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一是许多资源型企业一般都处于垄断地位,缺少

竞争,企业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二是跟我国的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机制有关。

在许多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机制上,有关部门通常采用的是成本加利润的方法,在确保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保持一定利润的同时,防止它通过垄断地位盲目涨价。比如航油,中航油在从中石化和中石油批进航油后,再加上一定的进销差价(过去是480元/吨,现在440元/吨)统一卖给各地机场。这样,无论市场如何变化,中航油都能确保雷打不动的差价利润。再比如成品油价格,有关部门考虑到炼油亏损这一因素,也实行了成本加适当利润的定价机制。

但是,这种定价机制不仅未能达到有关部门所期待的降低成本的目的,反而造成了公众反应强烈的高油价问题:中国的航油价格名列世界前茅,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已经超过了美国。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并不难理解,既然成本加适当利润是定价的模式,那么,企业将成本抬得越高显然对自己越有利,企业提高职工收入也就顺理成章。

因而,此次发改委再次通过成本监审来确定水价,有可能重蹈覆辙。既然管理人员工资及福利费、业务招待费、取暖费、会议费和差旅费等,均可作为期间费用计入成本,企业就能找到足够多的漏洞可钻。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水价已经涨了很

多倍。以北京为例,从1991年8月至2004年8月,北京市的水价经历了9次调整,每吨水实际已上涨了2233倍。(《北京晚报》2005年6月26日),如果水价继续快速上涨,有关部门该如何面对公众的质疑?

但是,无论价格如何涨,距离相关企业的期望值总是存在相当差距。有关部门在对待成本这一问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至少从效果上看是这样的,因为现行的定价机制不是在促使相关企业努力降低成本,而是努力抬高成本。由于相关企业层层这样做,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有关部门应尽快找到一种更好的定价机制,走出成本定价的误区。

万能房东与政府责任

□冯玉国

公权力正在“培养”万能的房东。据昨天的《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警方透露,房屋出租前,警方将与每位房东签订安全责任书,房东将首次对出租房客的人身安全承担主要责任。警方要求房东出租给承租人的房屋要安装合格的风斗,并为承租人提供合格炉具以及提醒住户在每晚睡觉前检查是否封好炉火等。如果房客发生煤气中毒死亡事故,警方将对房东处以每月房租金10倍以上的罚款。

而在不久前,北京什刹海街道米粮库社区租房,房东要与房东签订安全、防火及计划生育协议书,并由社区计生主任查验婚育证明后,方可入住。福建省也计划用9个月的时间开展打击传销的专项活动,据报道,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下文规定,把房子出租给从事传销活动的不法分子,房东也要受到严惩。

可以想象,随着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越来越频繁地向公众转嫁相关职责,我们的房东必将越来越万能,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肩负多种政府职责而不领取任何报酬的微型“政府部门”。房东被要求履行责任,并可能因为“失职”面临重罚,这意味着,房东的责任其实比有关部门的责任更重——既不能推卸责任,也无法得到为履行责任所得到的任何经费。这种情形难道不荒唐吗?

实际上,政府有关部门赋予房东的上述职责,原本都与房东没有直接关系。计划生育有计生办负责,防火有消防部门负责,传销有公安部门和工商部门等予以打击……公众纳税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很好地履行上述职责,公众通过纳税

让出一部分自身的利益,目的也是为了换取上述服务,有关部门没有理由通过签订“责任书”等形式将自己的责任向房东转嫁。

根据权利和责任对等的原则,有关部门在将部分职责出让给公众的时候,它们同时也应该出让一部分财政拨款,而不能在享受财政拨款数额不变的情况下,转嫁自己的职责。

离谱的是,有关部门竟然通过处罚的形式,强迫房东承担相应责任,并且罚款金额非常大。如果房客发生煤气中毒死亡事故,警方将对房东处以每月房租金10倍以上的罚款,倘若一个月的房租是3000多元,那么,警方对房东的罚款金额将高达3万多元。而对警方罚款行为作出规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除了“黄、赌、毒”保留3000至5000元的处罚外,其他的违法行为最高也不过给予1000元的处罚(过去是200元)。警方擅自设定如此大额的罚款金额,有滥用权力的嫌疑。

警方要求房东“提醒住户在每晚睡觉前检查是否封好炉火”也缺少现实可行性。房东在将房屋租出以后,使用权就归房客所有,房东无权对房客的生活进行干涉,而且,相当一部分房东并不和房客一起住,这些房东很难做到“提醒住户在每晚睡觉前检查是否封好炉火”,进一步说,即使房东真的能够做到,房客也未必愿意接受。人家租房就是为了有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房东如果整天对人喋喋不休,房客恐怕也无法忍受。因而,恐怕没有哪个房东能够真正去按照警方的要求去做,如此,相关规定岂不是要被悬空?

一再出现的向公众转嫁责任的这种做法令人忧虑。一旦这种做法进一步普及,必将导致有关部门进一步懈怠自己的固有职责,引发公众的不满。